

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看中国未来的发展

2011-06-07 10:46:28

陈文冬

如果将社会看成是一个大系统,并将它简单划分成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进行分析。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对一个复杂的大系统进行演化分析时,特别是象社会这样的复杂的大系统的整体特征,就必须剖析这个系统的结构和作用机制,也就是分析大系统是由哪些子系统组成,这些子系统之间又是怎样相互作用、相互调节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是人类活动的组织形式,是由人结成一定的关系组织起来的。而人与人的关系除了自然属性的血缘关系外,社会属性的关系从宏观角度看无非是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文化关系。

在一个社会内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者都在发展变化着,它们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尤其是最活跃的经济因素的不断发展,势必导致三个子系统之间的不适应,从而使社会结构出现不稳定和危机。当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极不适应,就要求社会变革,其中最激烈的方式就是以革命的形式来调整社会结构。调整可能造成两种结果:

一、旧结构被破坏瓦解了,失去了恢复的能力,同时,在原有社会结构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适应、相互调节的结构,革命到来时,新结构就会取代旧结构,社会演化为新的形态。显然,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学家们经常提到的欧洲社会演变过程。

二、当社会结构中三个子系统偏离适应状态以至于旧结构无法再维持下去时,引起原有旧结构的崩溃。崩溃后虽然消除了各子系统中互不适应的因素,但由于旧的社会结构中新结构的萌芽尚未成熟无法出现新的社会结构,这样就使得大系统迅速回到原有的适应状态。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演化的写照。中国封建社会除了在其结构形态上有长期停滞的特点外,另一个特点封建王朝的周期性更替。以大时间尺度来衡量,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从建立、发展趋于鼎盛,直到显露出社会危机,暴发动乱,崩溃,每隔两三百年就会发生一次激烈的大动荡,旧王朝覆灭了,新王朝代之而起,呈现出一种时间上的周期性。

我们以中国的封建社会的演化为例看这个问题,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封建官僚体系为政治形式的社会形态。小农经济是一种分散的自己自足的经济,中央集权的政治形式与欧洲的封建庄园社会不同,它通过官僚体系直接管理数量庞大的农民。这在技术上几乎难以实现,于是统治者利用儒家思想这种以宗法等级为基础思想,以治家的理念外推到的治国,形成治国与治家都用相同的理念结合,这样做的好处是弥补管理技术上的不足。一般王朝初期经济情况较差,这种封建官僚体系比较精干还可以应付简单的小农经济。但到王朝后期经济经过长足的发展一方面一些城市商业经济日益繁荣,另一方面土地大量被兼并出现大量失地农民,这时官僚体系已无法应对这种情况它既不能应对复杂的商业经济,另一方面此时官僚体系的腐败也不可能解决土地兼并问题,腐败也与儒家思想不容正直的儒生不能通过科考体系进入官僚体系。这就造成官僚体系更加腐败。最后就是农民起义旧王朝崩溃。从上面的简单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经济、意识形态、政治形态之间只有着复杂的关系,只有相互适应社会才能稳定发展。

再看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西方的民主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政治上以多党竞选执政,三权分立的制衡体系为基础。市场经济是一个高效率的经济体系,而民主体制确是一个效率比较低的体制。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高效率,西方政府采取的小政府的自由经济策略,政府尽可能减少对市场干预。同时市场经济需要市场主体之间能平等公平的竞争,这也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强调人的平等、民主、公民的权利。从整体上看西方资本主义经过2、3百年的发展已经成熟,相对稳

定。资本主义经过一再调整通过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结合，要么稳定就业促进增长（北欧的福利国家），要么增加社会需求缓和社会不平等（以美国为代表），至今仍容纳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这次金融危机给整个西方世界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但首先这种打击大多限于经济层面，尽管有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如希腊、中东一些国家出现了政局动荡，但西方的主要经济体无论是在意识形态还是政治形式上未出现异常，这说明资本主义远未到末落时期。

反观目前中国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上实行民主集中的一党执政。由于是转型期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者并不能非常好的相互适应，产生了很多的社会矛盾与现象。

一、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

经济转型首先带来的是人们思想的转变。以前传统的计划经济下的思维方式被抛弃，国家不再负责一个人从生到死的全过程，人们开始为自己奋斗而不是为国家奋斗。意识形态开始多元化，尽管政府仍然在倡导主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但越来越多的流于形式，关键在于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行为方式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不完成吻合。公有制基础正在弱化民营、外资等私有制经济已经兴起，这种变化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的变化。主流意识形态对国家、民族、人民等概念的宣扬以不能完全适应这种变化。因为市场经济是以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对人的行为引导是通过经济利益而不是荣誉，奖励的主体也从以前的国家、政府变成了企业。尽管政府也有对劳模、三八红旗手等等的先进个人事迹进行表彰但覆盖面太小不具有普遍意义。

另外我们是在一代或两代人的时间内进行了工业化的农业社会。在西方用了200年或更长时间才做到的事情，在这里只用了大约60年（如果只算改革开放只用了30年）。所有的一切都被挤压进一个非常短的时间框架内，在社会飞速变革的时期，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农民工进城）。人与人之前已确立的认同消失了，人们必须重新界定自我确立新的认同。作为政府应该调整主流意识形态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否则就只能被其它的意识形态所占领。

第三现代社会下如何传承传统的价值观念，比如：勤劳致富。现在社会最受关注的是一夜暴富的神话。大多数依靠辛勤劳动的农民只能实现温饱，城市工薪阶层也许能实现小康代价是成为房奴、卡奴、孩奴……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还有大量的蚁族、悲催族，他们无法被大城市接纳也无法回到家乡。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如何向人们解释这一现象？再比如雷锋精神，过去说雷锋出差好事做了一火车，但现在市场经济乘客坐火车是一种契约关系。乘客付了钱是消费者他有权享受乘务员提供的服务，如果乘客未能享受到相应的服务乘客可以提出议异的。相反假若某位乘客出于好意帮助乘务员工作，但由于不是专业人员他的帮助造成了列车或其他乘客的损失帮了倒忙，这时应该如何处理？我们经常可以在报纸上看到有老人在马路上摔倒却无人相助，或者有人帮助了摔倒的老人却被讹诈。这些都突显传统价值观念的尴尬处境。对于传统的价值观念应该结合现在的实际情况进行扬弃。即使要发扬光大也要融合现代社会的新形势。就以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为例，即使在市场经济情况下我们依然需要这种精神只是他的表现形势不同了，比如：社会义工、世博园里的小白菜、各种慈善活动……

主流的价值观一定是与人们日常行为紧密相关，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倡导某种价值观念而不去解决这种新的或旧的价值观念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造成的各种问题。人们是不会接受一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价值观念。一方面是传统主流国家、民族、人民利益这样的价值观念，一方面是现实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引导的价值观念。其实在国家和个人之间还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如企业、社区、村庄、民间团体……我们可以大力发展新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这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相悖而且更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当初农村改革是农民自发的实行家庭承包开始，这当然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且很快就取得了突出成就，但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农业就逐渐落后了。因为一家一户的单干模式是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反观韩国的新农村运动是在国家领导下以乡村建设为引导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为开始的。这更有利于农村的发展。个人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只有自发合作抱团组社才能抵御市场风险，而政府应该鼓励资助搞的好的合作社，正如当年韩国的新农村运动一样。除了农村在城市应该大力发展人文社区。我经常在地铁里看到一些新闻报道。上海一些小区居委的社区工作做的很有特色，提高了社区的凝聚力。这是非常好的现象。社区是由人组成的，邻里之间本来就应该有很多的交往与人际关系，但很多新的小区人与人之间很陌生。现代人的人际关系大多在公司与社会活动中，居住小区中反而很少。政府的基层部门能推动这种人际关系与联系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非常重要。还有养老、教育等等在很多社会领域建设各种组织团体，政府通过组织引导鼓励，把人们重新引入到集体主义中来，以重新使人们产生归属感增强社会的团结稳定。

二、政治领域中的问题

政治领域中的问题就从三个代表说起。三个代表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就应该做到以下两点：

1. 尽可能少的自身利益；
2. 与老百姓有尽可能多的共同利益；

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奋斗，没有自身利益的人和部门是不存在的。而且由于传统的主流价值观弱化通过崇高的理想鼓励人们做贡献也日益困难。那就应该想办法使政府和官员们的利益与老百姓的利益挂钩。遗憾的是前的官员考评体制是从上至下，官员们的利益由上级决定，这也注定了官员们的行为依赖上级。我们的政治体系中人民代表只在最高层两会时发挥作用。针对最高级别的中央各部门制定目标决意，反映民意。通过中央一级级下沉实现管理，但这种传达在一层层的权力体系内很容易失真、扭曲、遗漏。因为缺少及时反馈和无权制约，老百姓利益受损时求助无门，只能进京上访。但这就造成中央政府纪检、监察、司法部门的巨大压力。另外中央政府官员与老百姓的距离其实很遥远。革命年代官员们可以和老百姓一个锅里吃饭，而现在高级官员们已不会与老百姓在一个菜市场买菜了。

要解决目前行政体系中的弊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 1、提高行政效率，压缩行政层级。如财政管理直接到县避免层层扒皮。通过体制改革、信息技术手段使管理扁平化。
- 2、改革基层政府的功能定位，县及以下政府部门以社会服务为主，弱化发展经济的职能，减少基层部门因经济发展压力而可能与老百姓的利益冲突。只有与老百姓有更多的共同利益政府才能真正为公众考虑。发展区域经济的目标更多地放在省市两级。从经济体量上考虑县域经济体量较小，各自为政的考虑不利于整体的发挥。当然中国经济如此有活力很大程度上是区域经济之间的竞争带来的。这种方式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减少经济竞争压力强化社会服务促进社会和谐。这一点对于基层部门促进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非常重要。
- 3、加强基层人民代表监督制度，加强当地群众民意的反馈、约束、改变官员只唯上不虑下的考核机制。对官员滥用权力的行为反馈、约束越及时效果越好，否则拖的时间越长越容易复杂化、效果越差。推动社区、街道、村庄等基层的民主、自治、人文建设。基层的民主与自治能减少政府行政管理的压力。在封建这会中儒家通过宗法制度在宗族、家族、村落内部形成一套行为规范体系以补充官僚体系管理水平低下造成的空白。现代社会尽管社会管理技术水平提高了，但社会生活的复杂度也更高了，而民主和自治的推进将会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经济领域中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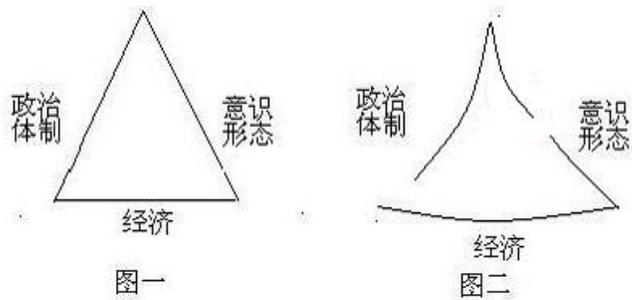
不论是意识形态还是政治体制的矛盾的问题究其原因还是在经济上。经济问题概括来说一是结构问题二是发展速度问题。在市场对效率的极致追求下，社会资源不断向高效率的行业聚集。这首先带来结构问题，比如农业问题。农作物的生长周期是自然规律决定的，这注定了农业的生产效率不可能象工业那样突飞猛进。在资本追求利润的驱动下资源被分配给了工业。不仅如此原本可用于农业生产的资源也被吸引了过去。农业这个弱势产业注定是要凋敝的，最近引人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根本原因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衰落后的挣扎。农业低效率并不代表它不重要，相反民以食为天，而且它还关系着农村和农民问题。

再说工业，传统制造业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儿去。看一下上市公司财报就知道了，传统制造业中毛利润能达到40%的制造业只有医药和酿酒。这种快速增长使我们迅速面临产业升级、人力资源升级。高新技术产业将需要大量的人材，这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内面临的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货币的发行。货币的超发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使问题严重化，或者说再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带来了更多的问题。中国大量发行货币应对的是土地交易。中国的经济数据增长，也依赖土地交易。我们只是在把土地、矿产等自然物通过资本融解后纳入到经济运行体系中，但实际上社会财富的创造是人而不是土地。通过土地交易增长的是经济数据而不是社会财富。以这种方式发展经济如果空气可以分割拍卖的话，也许我们的GDP立即就会超过美国。大量发行货币的恶果不仅限于资本市场泡沫、通货膨胀，它同样会影响到社会生活中。货币就象洪水一旦过量就会漫堤成为危害，正如我前面解释的灰色收入问题，除了实体财富更多的是货币财富引起的灰色收入。而且发行货币是政府行为离源头越近的人收益越大所以大量发行货币必然会加剧社会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这就是大企业有用不完的资金，而小企业借贷无门的原因。

以上只是众多问题的一小部分，因为有太多人讨论我就不赘述了。

四、我们不能孤立地看意识形态、政治、经济问题，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表现为相关联的社会问题。我们可以把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形象地想象为三角形的三条边。一个稳固的三角形三条边是笔直的三个顶点是牢固的（见图一）。但现在由于经济发展过快使政治体制与传统主流的意识形态无法适应就会出现弯曲和断裂。



首先看图二中的顶点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断裂。在政府高层通过强化学习政治与意识形态还能结合，但在社会底层人的行为更多的受到市场经济的调节，意识形态正在摆脱传统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人们更渴望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如平等、民主、反对特权与垄断……

其次看图二左下角，这种断裂主要发生社会底层，政府的基层部门最能感受到这种压力。总体上说是政府的行政效率低、管理技术落后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效率，只能通过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问题这必然带来严重的副作用。比如城管与小商贩、房子强拆、权力腐败、进京上访……

其实这种断层正在从社会的方方面面表现出来，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些现象背后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适应的结果，比如灰色收入。去年有学者说中国的灰色收入超过5万亿元。灰色收入本质上是一种财富分配方式，它属于生产关系范畴。这说明我们生产力提高了生产出了大量社会财富，但在分配时却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将财富合理地分配给公众。巨量的社会财富只能以非正常的渠道分配。所有的社会财富都时劳动创造的，为什么这么多的财富不能成为劳动者的报酬？社会财富的分配关系最基本的社会公平问题。现在社会贫富差距巨大，三十年我们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基尼指数”则从不到0.2越升到0.45，超过了国际警戒线的水平。

腐败我们大多把它看成是制度建设的缺失、法律或者个人品质问题。其实腐败现象也是财富分配不均一种表现。因为财富大量集中在政府或少数有公共权利的人的手中，一旦能够与市场结合那就必然会产生寻租行为。站在宏观的社会角度看这是内因至于制度、法律、道德品质等等都是外因。有时一些政府官员面对的市场经济压力如此巨大，以至超出了他们决策能力从而使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比如河南交通厅几任厅长接连落马。河南省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大力发展交通业，一年投资额达到一百多亿，平均每天几千万。如果按规定几十万元的投资就要开会走流程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经济对官场的压力。

我们希望能够调节市场经济行为，但这需要高超的技巧，这对于政府的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当我们没有管理技能与技术保证这种调节时，通过简单的行政方式调节市场也会有副作用。比如直接干预市场价格，人为压低电煤价格，结果出现电荒。

经济发展产生了大量的经济关系，很多需要行政司法体系调节。这给司法体系造成很大压力。供给跟不上造成社会正义稀缺。

在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目前在官方经济学界有一种非常乐观的倾向，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我们的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有学者开始掐指头算中国的GDP什么时候能超越美国；我们应该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再在我看来这种乐观本身更象一个陷阱。别忘了前苏联经济也曾达到过世界第二，单纯的总量比较没有意义。过去三十年之所以能取得辉煌的经济成就，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市场经济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二是人口红利。而接下来的三十年中国经济要转型产业结构要升级需要的是人材。人口红利消失了如果教育跟不上就变成了人口负担。而人材培养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一个小学毕业的农民运气好也许可以达到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但这与8亿农民达到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是不一样的。所以目前我们不应该讨论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我们应该避免当年苏联犯的错误。前苏联为了与美国拼军力大力发展军工等重工业造成经济结构失衡。经济问题也是当年苏联的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之一。现在我们过分急于从经济甚至是GDP上超越美国，经济上过快的发展引起意识与政治领域的无法适应，造成社会结构失衡就会产生大问题。简单说就是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样说也许很多人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要优于资本主义，怎么可能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但马克思提到的社会主义是从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而中国不是。中国现在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提到的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如果上层建筑可以适应经济基础我们就不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了。有一本《20世纪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的书，书中在谈到苏联解体时过于强调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所起的负面作用。指责他们主动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其实在斯大林时

期苏联的社会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方面已经严重偏离正常的状态成为一种不稳定的结构。经济结构过于发展军工与重工业，政治上官僚特权，意识形态上搞个人崇拜，几十年下来整个社会已经积重难返，特别是民心尽失这一点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搞转向时没有出现群众自发的抵制就可以看出。其实整个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厦已经是一栋危楼，修复它将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而言推倒然后重建将是一个更可行的选择，当然他们重建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因为错误的政策使人民少吃少穿而特权阶层享受着种种福利，社会主义已经失去了群众的支持，重建已成为不可能。

当然前苏联与现在的中国无法相比，我们的改革总体上使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农村医疗、养老保障正在改善农民的保障水平，这大大巩固了社会的根基，减少了经济危机转化为生存危机、社会危机的风险。但贫富差距、社会正义的缺失等等使中国人的社会心理总体的仍很脆弱。日本大地震时中国一些地区出现抢碘盐的风波就是这种脆弱的表现。另外一些错误的政策比如土地、房产政策，造成中国百姓的生活成本提高生存压力增大。其实最早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房产政策中公共福利性质的房子是占大部分的，商品房只是一小部分。如在1989年深圳的《深圳经济特区居屋发展纲要》就有明确的表述。那时将房子分为三类：福利商品房、微利商品房、市场商品房。“在一九八九至一九九零两年建房计划中，福利商品房和市场商品房各占30%，微利商品房占40%，以后逐步缩小‘两头’（福利商品房和市场商品房）的比例，扩大‘中间’（微利商品房）的比例”。但最后所有房子都成了商品房，而商品房最后又成了投资品。

最后我想重提一下我们常说的，我们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们日益增长物质文化需要。我们一直在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工厂了“made in China”已经出现在全球每个角落了，我们应该认真讨论一下我们自己的需求是什么，我们能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吗？什么样的需求应该满足什么样的需求不应该满足，因为资源是有限的。当然这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应该是个意识形态的问题。中国已经是世界最重要的奢侈品消费市场。越来越的普通人开始使用信用卡消费，在经济危机时期更有人把消费与爱国联系在一起。上世纪中期一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入研究的西方学者弗洛姆在他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满足于物质贪婪的资本主义精神正在征服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控制人的欲望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这是一个历史的讽刺。社会主义面临着堕落为这样一种体系的危险，即它能使较贫穷的国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实现工业化，它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而不是以人的发展为主要目标。……消费人是这样一种人，他的主要目标首先不是拥有物品，而是不断地消费，以此支填补他那消极、孤独和焦虑的内心空虚。个人不能控制自己的工作环境，他感到软弱，孤独、厌烦和焦虑。同时通过广告这一中介大量推销工业品而谋取利润的需要，又将人变成了贪得无厌的人。他是个永无止境的消费者，把烟、酒、两性关系、电影、电视、旅游，甚至教育、书籍等一切东西都变成了消费的项目。并且创造了许多新的人为需要，人的趣味也受到控制。对消费的贪求，其极端形式被费洛伊德称之为“感观接受型品格”，在今天的工业化社会里它已